

嵌入与传承：新加坡华族家庭祖语治理研究*

刘 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 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李叶凡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薛炜俊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提 要 文章运用社会语言学、经济社会学理论及案例研究法，在实地调研新加坡华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祖语治理”的概念，考察不同类型华族家庭（本土华族、新移民华族、本土与新移民华族组合的家庭等）的语言治理尤其是祖语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分析“嵌入”作为家庭祖语治理机制的类型及特点。文章指出，跨学科视角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外华族祖语治理的区域国别特征以及华族祖语的活力和韧力。

关键词 新加坡；华族家庭；祖语治理；嵌入机制

Embeddedness and Inheritance: A Study of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in Chinese Families in Singapore

Liu Hui, Li Yefan, Xue Weijun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ies of sociolinguistic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field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usage of Chinese families in Singapore, examines the language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ncept and model of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families (native Chinese, new immigrant Chinese, native and new immigrant Chinese combined families, etc.), and analyzes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beddedness” as a family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s helpful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s.

Key words Singapore; Chinese families; heritage language governance; the mechanism of embeddedness

* 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场景传播理论下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GZYB35）、暨南大学广东语言文化海外传承研究基地项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祖语”意为“祖传之语”，主要指社会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具有历史性、象征性、资源性的性质，以及边缘化、需要学习的特点。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和社会现实使得华族的祖语生态逐渐形成并不断凸显(郭熙, 2017)。相关数据显示, 2020年, 超过77.4%的5—14岁新加坡孩童在家主要讲英语, 比2010年增加了近一半¹。新加坡华族²祖语传承面临极大的挑战。

本文在实地调研新加坡华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祖语治理”的概念, 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 “语言治理”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与海外华族祖语传承的特点相契合。语言治理是对语言生活的治理, 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治理路向(李宇明, 2020), 它打破了过去单一主体管理或命令式的“垂直性”语言规划层级, 政府、社区、学校、家庭、个体等多元主体民主化、参与式、互动式地协作管理, 构建“水平型”发展的语言规划新模式(沈骑, 2021)。海外华族在祖语治理方面具有族群性、自主性、代际性等特点(刘慧, 2022), 华族家庭与“华社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学校)整合利用族群内外的资源, 共同致力于华族语言文化传承(刘慧, 2021)。

其次, 语言治理具有广视角、跨学科的特点。语言治理从社会经济的视野来研究语言问题, 考察语言作为社会现象或经济资源和交际工具时的特点及问题(王玲、陈新仁, 2020)。海外华族对所在国的贡献以经济为首(王赓武, 2013), 华族家庭语言治理也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学特征, 也就是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通过日常交流、教育等方式, 共同参与家庭语言实践, 协调处理语言问题, 从而实

现情感交流、经济利益获取、社会地位提升等目标。家庭语言治理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部分, 纵向治理如家庭成员的祖语传承和语言教育, 横向治理如家庭协调处理与政府、社区、学校等不同主体语言治理的关系。

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 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新移民数量急剧增长, 2020年二者已成为新加坡数量位居前二的移民来源(刘宏, 2022)。本文实地考察新加坡不同类型华族家庭(本土华族、新移民华族、本土与新移民华族组合的家庭等)的语言治理尤其是祖语治理的理念和模式, 分析“嵌入”作为家庭祖语治理机制的构成及特点, 为海外华族祖语传承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理论借鉴。

二、研究理论、对象及方法

语言根植于经济社会之中。这一特性需要我们将语言学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相结合(孙涛、张卫国, 2021)。近年来嵌入理论的知晓度和应用性逐渐增强, 已成为连接经济学、社会学与组织理论的桥梁(兰建平、苗文斌, 2009)。嵌入主要是指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间多边复杂的联系(杨玉波等, 2014)。学界对新加坡新移民华族的嵌入研究主要是考察华人企业家及新移民社团对祖籍国和移居地的双重嵌入(刘宏, 2021), 对华族家庭的嵌入情况关注较少。

本次调研的新加坡华族家庭³共11户, 均为核心家庭。其中新移民华族家庭5户、本土华族与新移民华族组合家庭3户、本土华族家庭2户、新移民华族与新移民非华族的组合家庭1户。11户受访家长均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下文简称PR)或新加坡公民。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可

分为描述性、解释性、评价性和探索性四类。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不依赖抽样原理，对研究背景不予控制，也不干预现象的变化进程，主要通过一个或数个案例说明问题，分析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孙海法等，2004）。本文综合运用社会语言学及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方法，采用描述性和解释性相结合的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受访家庭祖语治理的理念、模式、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祖语治理的嵌入机制的类型及特点。

三、受访家庭祖语治理类型及特点

根据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我们将受访家庭分为三类：传承型（6户）、兼用型（5户）、转用型（1户）。传承型家庭交际用语以华语为主，兼用型家庭交际用语兼用华语和英语，转用型家庭交际用语由祖语转变为英语。之所以将传承型和兼用型家庭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是希望借由本次调研考察分析新加坡华族家庭祖语治理的经验及机制。

（一）传承型家庭

受访的传承型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传承型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家庭编码	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CC1	中国新移民家庭。夫妻均在新加坡获得硕士学位。受访人原生家庭主要使用闽方言。 受访人L先生，福建人，妻子为山西人，二人在新加坡留学后留下工作至今，均为新加坡PR。 育有一子，5岁，新加坡出生，为新加坡公民，目前就读于新加坡某幼儿园，具备基本的华语和英语听说能力。
CC2	中国新移民家庭。夫妻二人均在新加坡获得博士学位。受访人原生家庭主要使用普通话。 受访人Y女士，吉林人，丈夫为辽宁人。丈夫是新加坡理工学院的老师，为新加坡公民。妻子是新加坡华研中心的老师，为新加坡PR。 育有一女，已成年，中国出生，为新加坡公民。女儿10岁时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专业，具备良好的华英双语能力。
CC3	中国新移民+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夫妻二人均在新加坡获得硕士学位。受访人原生家庭主要使用濮阳话。 受访人J女士，河南人，已加入新加坡国籍，丈夫为新加坡本地华人。 育有三女，均为新加坡公民。长女6岁，次女4岁，小女1岁。长女和次女均掌握基本的华语和英语听说能力。
CC4	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夫妻均在新加坡获得博士学位。受访人原生家庭主要使用闽方言。 受访人M女士，新加坡某大学华文教师，丈夫是新加坡某大学的英文老师。受访人掌握华、英、粤、闽四种语码。丈夫掌握英、华、粤三种语码。 育有一女一子：女儿28岁，现居澳大利亚，掌握华语、英语、闽方言、韩语；儿子23岁，律师，掌握华英双语。
CC5	马来西亚新移民华族家庭。夫妻均获得硕士学位。受访人原生家庭主要使用闽方言。 受访人Y女士，新加坡华研中心研究员，丈夫是工程师，二人均为新加坡公民。受访人及丈夫掌握英语、华语、闽方言、马来语四种语码。 育有一女一子：女儿3岁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双国籍，掌握华语、英语及部分闽方言；儿子8个月，新加坡公民。
CC6	越南新移民华族+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受访人Q女士为越南华人，家庭主妇，未受过高等教育，原生家庭主要使用越南语。丈夫是新加坡本土华人。受访人掌握越南语和部分华语。丈夫掌握英语及华语。 育有二子，二子为双胞胎，6岁，均为新加坡公民，均已掌握基本的华语和英语。

综合表1的资料和访谈信息,我们将传承型家庭祖语治理的特点归纳如下。

(1) 治理主体是新移民华族,其祖语传承可分为主动传承和被动传承两种。表1的CC1—CC5属于主动传承型。家长均为高学历人士,具备良好的华英双语能力,他们主动选择华语作为家庭主要交际用语。CC6家庭属于被动传承型。受访者Q女士是越南第三代华人,中学毕业赴马来西亚打工并学会了日常的华语口语,华语读写能力较差,英语水平很低;其丈夫是新加坡本土华人,华英双语能力比妻子好,但由于工作忙与孩子互动较少。Q女士在访谈中表示,希望为孩子提供华英双语并重的家庭语言环境,但是由于上述原因,目前家庭用语以华语为主。

(2) 主动传承型家庭的家长在语言治理方面体现出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未照搬国家和学校的语言治理模式,而是采用“互补式”的治理理念和“分域治理”的治理模式,并不以牺牲母语为代价学习其他语言,从而实现双语能力“增益式”发展。家长在访谈中表示,他们利用自己华语能力强的优势使家庭域与学校域形成互补,学校域以英语教学为主,家庭域以华语传承为主,培养子女的华英双语听说读写能力。而被动传承型的家长缺乏明确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在治理目标方面持“双语能力不均衡发展”的观点,希望子女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和基本的华语听说能力,不太重视培养子女的华语读写能力。

(3) 主动传承型家庭的祖语治理实践方式多元,家长与子女用华语频繁互动,实现华语的活态

传承,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与祖(籍)国亲友间的情感交流,建构家庭成员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CC1—CC5家庭的祖语治理实践方式主要包括:①日常华语交谈;②亲子阅读华文书籍;③返乡探亲;④教孩子写汉字;⑤观看华语节目;⑥听华语广播;⑦与讲华语的家庭交流;⑧参加社区的华族文化活动等。其中前三种方式每户都使用,其他几种方式也较为常用。此外,家长也开展少量的英语活动,比如陪孩子阅读英文书籍、观看英文动画片、送孩子参加英语口语班等。

(4) 语言治理侧重“问题导向”,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践(王玲、陈新仁,2020)。主动传承型家庭在语言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①现行的语言教育政策不利于华族新生代华英双语能力的均衡发展。华文在学校只是作为单一学科进行教学,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授,使得新生代的华语能力发展相对滞后。②考试分流制度和语言能力测试存在不足。新加坡主要依靠考试实施分流教育,但语言测试分数的高低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应试者的语言能力,反而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使其为了孩子的学业前途轻视甚至舍弃家庭的母语环境而转用英语。③华语实践场域有限,难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实现活态传承。④本土出版的高质量华语书籍较为匮乏。⑤对新加坡语言变体持消极态度。如对“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认同度不高,希望子女学习欧美的标准英语。

(二) 兼用型家庭

华英双语兼用家庭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表 2 兼用型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家庭编码	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JY1 华语为主， 兼用英语	中国新移民家庭。夫妻均为硕士学历。 受访人L女士，上海人，新加坡某国际学校华文教师，为新加坡PR。丈夫从事金融行业，为新加坡公民。 育有一女，5岁，新加坡国籍，目前就读于新加坡双语幼儿园，会说华语、英语和少量的上海话。 父母之间说华语，母亲和女儿说华语，父亲和女儿说英语，保姆和女儿说英语。
JY2 华语为主， 兼用英语	马来西亚新移民华族家庭。夫妻均为硕士学历。 受访人Y女士，新加坡某公司人事部经理，丈夫为新加坡IT从业者，夫妻均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PR。 二人均掌握华、英、闽、粤四种语码，会说马来语但不熟练。育有一女，10岁，新加坡国籍，掌握华语和英语。 父母之间说华语，父亲、保姆和女儿说华语。母亲和女儿说英语。
JY3 华语为主， 兼用英语	中国新移民+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夫妻均为硕士学历。 受访人Q女士，吉林人，新加坡幼儿华语教师，新加坡PR，丈夫为新加坡本土华族。 受访者掌握华语、英语、东北话三种语码，其丈夫掌握华、英、粤、闽四种语码。 育有一子一女，儿子7岁，女儿5岁，均为新加坡公民，掌握基本的华语和英语。 父母之间说华语，母亲和孩子说华语。父亲、保姆和孩子说英语。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少。
JY4 离异前：英 语为主，兼 用华语；离 异后：华语 与英语使用 较为均衡	中国新移民+英国非华人家庭，离异家庭。离异夫妇均为硕士学历。 受访人Y女士，中国台湾人，新加坡华语教师。前夫为英国人，公司职员。目前Y女士和3个孩子生活。受访者掌握华、英、闽三种语码，前夫掌握英语。 育有一子二女，均为英国国籍。长子22岁，长女17岁，次女12岁，长子与长女分别在11岁和6岁时从英国到新加坡，长子华英双语能力平衡且较好，长女和次女英语能力优于华语能力。 离异前，父母用英语交流，家庭用语主要为英语。离异后，母亲和孩子用华语交流，孩子之间用英语交流。
JY5 英语为主， 兼用华语	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夫妻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本科学历。 受访人Z先生，某公司行政经理，毕业于早期华校，掌握华、英、粤三种语码。妻子为某学校科学教师，毕业于早期英校，掌握华、英、粤、闽四种语码。 育有二子，长子21岁，在南洋理工大学就读；次子19岁，在服兵役，均为新加坡公民。 母亲和孩子说英语，父亲和孩子说华语，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较长，孩子以说英语为主、华语为辅。

综合表 2 和访谈资料，我们将兼用型家庭包括祖语在内的语言治理特点概括如下。

(1) 治理主体也是新移民华族。家长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良好的华英双语能力。家庭成员采用“协同式”的治理理念和“分工治理”的模式，家长和保姆发挥各自的语言优势，分工合作，采用一人一语 (OPOL) 等交际策略，形成“华语为主，

兼用英语”“华语与英语均衡使用”“英语为主，兼用华语”等类型的语言交际格局，帮助子女实现增益式双语能力发展。

(2) 双语治理的实践方式多元，与上一小节所述的祖语治理方式相似，主要包括：①日常的华英双语交流；②双语亲子阅读；③观看双语节目；④返乡探亲；⑤送孩子参加华语和英语的课外辅导班。

但不同类型家庭的华语和英语实践活动的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双语亲子阅读活动为例,JY1和JY3的受访家长从中国购入大量华文书籍,亲子阅读以华语阅读为主。JY2和JY4的亲子阅读是华语阅读和英文阅读各占一半。JY5的亲子阅读以英文为主,家中80%为英文书籍。差异形成的原因与后文所述的嵌入机制有关。

(3)兼用型家庭在语言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与传承型家庭类似的问题。受访家长认为,现行的语言政策和教育体制使得学校的华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华语实践均面临困顿局面,华族对华语的尊重和热爱正在逐渐减退。

(三)转用型家庭

受访的转用型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如表3所示。

表3 转用型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家庭编码	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ZY1	新加坡本土华族家庭。夫妻均为专科学历。受访人S女士,办公室文员,丈夫为企业经理。受访者掌握华、英、粤、闽四种语码,丈夫掌握华、英、闽三种语码。育有两子一女(三胞胎),均22岁,新加坡公民,英语能力强于华语能力。

表3中ZY1家庭主要采用“顺应式”的治理理念和“单一治理”的模式,为了顺应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语言治理的实践行为。从原生家庭到核心家庭,其语言交际格局经历了“汉语方言为主→华语为主→华英并用→英语为主”的转变过程。在受访人的原生家庭中,其父母交谈以汉语方言为主,华语为辅。受访人与其兄弟交谈以华语为主,偶尔使用汉语方言。受访人结婚后至子女入学前,核心家庭成员交谈使用华英双语。子女

入学之后,家庭日常用语转用为英语。ZY1并非特例,而是新加坡华族家庭语言治理的普遍现象。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语言的变化是国家宏观语言政策在微观语言生态的投射。

受访人S女士表示,子女年幼时,她曾陪伴其阅读华英双语读物、观看双语节目。孩子具备基本的华语听说能力。子女入学之后英语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家庭用语也随之转为英语。S女士认为目前语言治理的问题之一是华族青少年华英双语掺杂使用的情况较为普遍,他们使用标准华语和英语的能力正在下降。她认为,受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影响,家境及成绩一般的华族青少年的双语能力难以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四、受访华族家庭的祖语治理机制

本次调研的华族家庭的祖语治理机制之一为嵌入机制,该机制是指家庭成员运用结构嵌入、政治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等方式进行语言治理,以达到优化治理理念、调节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果的目标。

结构嵌入是指华族家庭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联性。本次调研显示,新移民家庭在结构嵌入方面采用祖(籍)国社会与移居国社会双重嵌入的机制。其中传承型新移民家庭主要采用双重偏向嵌入机制,对祖(籍)国的嵌入程度高于对移居国的嵌入程度,与祖(籍)国社会交流频繁,经常往返祖(籍)国与移居国,工作语言主要为华语;兼用型新移民家庭主要采用双重均衡嵌入机制,对祖(籍)国和移居国的嵌入程度较为均衡,其配偶为新加坡本土华人或非华人,工作语言主要为英语,与新加坡及欧美的英语人群交往频繁。

结构嵌入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之间具有联动关系。政治嵌入包括家长的国家认同

和族群认同，认知嵌入包括家长的多语态度，文化嵌入包括家长的多元文化认同。政治嵌入方面，新移民华族家长的华人身份认同感强烈，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较弱。认知嵌入方面，其具备强烈的华语忠诚，认为培养子女的华语能力和英语能力同样重要。文化嵌入方面，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很高，对新加坡本土华族文化和欧美文化的认同感相对较低。这些嵌入机制作用于祖语治理，推动家长利用超高端筛选的移民政策所具备的高学历优势和跨国家庭资源（周敏、王君，2019），将子女培养成为华英双语兼备的人才。

对于本土华族而言，无论是传承型、兼用型还是转用型家庭，主要采用的都是单一嵌入新加坡本土社会的机制。其中传承型家长工作语言为华语，兼用型家长毕业于早期新加坡华校，华语能力强且重视家庭祖语治理，子女在英语为主的大环境中成长，同时也利用华语优势在全球华语圈跨国流动，获得语言红利。转用型家长华英双语能力均为中等，子女入学后家庭用语转为英语，以适应本地社会的需求。政治嵌入方面，多数本土华族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强烈，对自身的华人身份认同感较弱。认知嵌入方面，其对华语的情感评价高，对英语的地位和功能评价也高。文化嵌入方面，其对新加坡本土多元文化的认同度高，对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认同感。上述嵌入机制使得多数本土华族家庭子女的双语能力呈现华弱英强的不均衡发展态势。

五、结语

家庭作为祖语传承最初的摇篮和最后的堡垒，

其祖语治理特点及机制将直接影响祖语传承的效果。本次调研显示，治理理念、模式、实践方式等要素是构成家庭祖语治理体系的要素，而家庭的嵌入方式正是推动上述要素形成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尽管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族在代际、职业、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如果其具备不同程度的双重嵌入，即同时嵌入祖（籍）国及所在国，在结构嵌入方面能够与华族或祖（籍）国保持联系和互动，在政治嵌入方面认同华族身份，在认知嵌入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华语忠诚，在文化嵌入方面认同华族文化，即使是第五代甚至第六代，依然可以实现祖语传承，如马来西亚、印尼峇淡岛等地华族即是如此。如果是单一嵌入所在国社会，则很可能出现传承中断和语言转用，本文所调研的新加坡华族家庭祖语治理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化时代华语圈与非华语圈国家间的跨国流动，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华族家庭双重甚至多重嵌入的情况，持续关注并研究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制定和实施国际中文教育及海外华语传承传播的相关规划，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海外华族祖语治理的区域国别特征以及华族祖语的活力和韧力。

作者简介

刘慧，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海外华语及华文教学。

李叶凡，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薛炜俊，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员工。

附注

- 1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xQsLZg3HlAuVI1We--NPdlgB----gsSFXUxivYHqNULOiM_,《新加坡人口调查结果出炉!超过四分之三的儿童主要在家讲英语》。
- 2 庄国土(2002)指出,“华族”是由保持华人意识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稳定的群体,是海外当地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陈衍德(2001)也指出,所有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就是“华族”,“华族”包括华侨、华人及华裔。
- 3 本次调研的时间为2018年1—6月及2019年2月。笔者利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Regional Language Center)任教及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Singapor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实习的机会,对两个中心的部分职员及其朋友的家庭语言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得约20万字的转写材料。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受访者姓名均用代码表示。

参考文献

- 陈衍德,2001.论华族: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作的探讨[J].世界民族(2):21-30.
- 郭熙,2017.论祖语与祖语传承[J].语言战略研究(3):10-19.
- 兰建平,苗文斌,2009.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1):104-108.
- 李宇明,2020.语言治理正当时[N].光明日报,2020-04-25(12).
- 刘宏,2021.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及其动力与特征: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4):9-20.
- 刘宏,2022.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加坡华人新移民[J/OL].Melbourne Asia review.[2023-12-01].<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E5%85%A8%E7%90%83%E5%8C%96%E8%83%8C%E6%99%AF%E4%B8%8B%E7%9A%84%E6%96%B0%E5%8A%A0%E5%9D%A1%E5%8D%8E%E4%BA%BA%E6%96%B0%E7%A7%BB%E6%B0%91/>.
- 刘慧,2021.柬埔寨华人家庭语言规划与华语传承调查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4):29-43.
- 刘慧,2022.海外华语传承的主体、机制与方略[R]//张日培.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22).北京:商务印书馆:57-70.
- 沈骑,2021.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与基本任务[J].语言文字应用(3):30-40.
- 孙海法,等,2004.案例研究的方法论[J].科研管理(2):107-112.
- 孙涛,张卫国,2021.观照与交融:论语言的社会学研究方向[J].江海学刊(1):124-129,254.
- 王赓武,2013.华人与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玲,陈新仁,2020.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82-90.
- 杨玉波,等,2014.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3):172-176.
- 周敏,王君,2019.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4):1-9.
- 庄国土,2002.论东南亚的华族[J].世界民族(3):37-48.

(责任编辑 赵青)